

· 研究报告 ·

基于“道-形-器”的《黄帝内经》藏象观研究

马振¹, 赵凰宏¹, 徐江雁²(¹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²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州 450000)

摘要:《周易·系辞》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由此延伸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即“道器观”。对这一哲学观的理解需要理解“形”这一普遍被忽视的文化概念,而形与“精气”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并随着“四时五行观”的成熟,形成完整的道器观体系。中医藏象观即是哲学观在医学方面的体现,通过哲学之体来探讨医学之用,深入挖掘藏象理论所蕴藏的思想内涵,以期当代藏象学说的发

关键词: 道; 形; 器; 精气; 藏象观; 黄帝内经

基金资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各家学说建设项目(No.国中医药人教发[2012]32号)

Research on the viscera state of *Huangdi Neijing* based on the ‘Tao-Shape-Implement’MA Zhen¹, ZHAO Huang-hong¹, XU Jiang-yan²(¹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²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In *Zhouyi · Xici*: ‘The metaphysical is the way, the metaphysical is the instrument’, which extend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system, namely the ‘Taoist view’.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philosophical view requires the understanding of ‘form’, a generally neglected cultural concept, and the fo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nsive’ theory, and forms with the maturity of the ‘four seasons and five elements of view’. A complete system of Taoist views. The concept of Tibetan medicine is the embodiment of philosophy in medicine. It explores the use of medicine through the body of philosophy,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ibetan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theory. This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Tao; Shape; Implement; Essential qi; Viscera state; *Huangdi Neijing*

Funding: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of TCM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rious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truction Projects (No.[2012]32)

“道器观”源于古人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是将万物的生命表达与其背后的自然规律相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思考方式。从最初《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256},到朱熹认为的“道器不二”,发展到明代王船山说:“物兼道器,一体三面”^[2]。可以说,对于“道与器”的论断是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这一哲学观的论断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藏象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道-形-器”的含义

“道”指自然规律,“器”指自然事物的客观存在,而独立于道和器之外还有“形”,这也是古人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即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既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光怪陆离,而是平淡中显现生命真谛,这也是古人思维中“执中”的体现。从思维观的角度讲,形也在古人思维中占据重要的一环。在理解事

物形的基础上,进而从认知上对其进行推演与归纳,如史宁中说:“一个环节是‘向上’的,即形成明确的概念并且基于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另一个环节是‘向下’的,即构建清晰的假说并且通过事实来验证这些假说”^[3]。向上的“环节”即形而上对道的探求;向下的“环节”即形而下对器的定义。因此,“道-形-器”这一机制是古人思考宇宙与生命的集中体现。

形是“道-形-器”的关键环节

“形”的含义,《说文解字》谓:“象形也”,段注:“形,象也”;《庄子·则阳》载:“天地,形之大者也”^[4];《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指对自然万物的具象化表达。

古人通过采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和赋予不同象以阴阳五行属性等手段,把不同事物各自的形象与其本质规律贯穿起来。如《素问·五运行大论》载:“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

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这些不同性质事物(东方-风-木-酸-肝-筋)之间之所以能建立内在联系正是与道之本体意义上的自洽性相一致。这里需注意的是,形在古人看来只属于“象”的范畴,不包含物质实体的内容,这在今人看来颇难理解,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区分中医学脏器功能与藏象的关键。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列子·天瑞》中的论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5]。此文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其中“太始”为“形之始”,而“太素”为“质之始”,形和质是分别构成宇宙的两个不同要素,形只代表形,有形未必有质,有形必待有质后才是完整的宇宙。

又如《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其实讲了3个概念,即:道、形和器,但自从孔颖达将形与质相混淆,解释为形即质后,这句话逐渐演变成了典型的非此即彼二元论观点。他解释为“道是无名之体,形是有质之称”^[6],认为形是有质的,即所谓有“形质”之称,但也正是由于把形质而等同于器,所以就形成了形器无区别的认识。这种二元论不仅是对古代宇宙观的曲解,也拉低了古人对生命层次的认识高度。

传统认识的道-形/器二元论,把形等同于器,而真正理解形的内含后,建立的则是“道-形-器”的思维观,形是沟通与器的重要环节,有形之后才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

精气是贯穿“道-形-器”的中介

道器观是古人思维观建立起来的宇宙认识体系,而这一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直接载体就是精气理论的产生,精气作为客观存在具有物质与能量的双重属性。自此,一器之功用即归于其自身具备之气,而人由形而体验此气,才能最终体悟道,故有“形气相感”,《管子·业内》:“修心静意,道乃可得”^{[7]271},修心即是感悟其气,即是修气。

传统文化中看待生命既非单纯注重实体,也绝非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而是心与物相交融的认识途径,就如庄子描述的“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通天下一气耳”;钱穆说:“人类文化是心物交融的,是生命与物质的交融”^[8]。这种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是建立在亲身体认基础上的再归纳,它超越主客体的界限,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枷锁,更注重事物给人带来的体验。而体验不仅是主观感受,它还是一种客观存在物,即“精神性生气客观化带来的存在于心物间的构成物”^[9]。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就是其具体的实践方法。基于相同的感受,不同质的事物可以相互沟通,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10]75},就是强调了解宇宙规律是要回归对事物最本真的体验。

以精气理论为例,古人由呼吸吐纳体验气的出入,进而联想到天地间如橐龠般存在气的升降浮沉,天地四时的变化即源于气的运动,气进而与四时五行结合,为宇宙变化的内在动力做出了逻辑解释。精气理论为宇宙观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形

成了以四时五行为框架,以天地四时为变化依据,以精气出入为内在动力的认识体系。精气理论的成熟肇始于《管子》一书,如《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转气如神,万物备存”^{[7]268}。自然万物以气相感,气运行的井然有序使万物生化有权,形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状态,即道之状态。转气如神就是借助气来体验万物本性以返本于道,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形与神俱的体现。故《淮南子·原道》谓:“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10]。形神之相离或相即依赖气的有序运动,“气作为道与万物之间的媒介,将道生化万物内在的动力机制解释为一种气化,这种气一元论的观念也为天人之间的统一性提供了根据”^[11]。由此,人体不再是灵与肉的简单结合体,而是更高层次的形与神俱的生命存在。

道器观映照下的《内经》藏象观

1. 藏象观中的“道”与“器” 《内经》中藏象观是建立在体察天地基础上的天人相应的生命观,使人体与自然之道相合,以保身长全。“器”则是指人的躯体及各实体脏腑组织器官,包括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为核心的中医生理病理体系,《调经论》所说:“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在此藏象观的指导下,即使在科技水平不足以从实体脏腑解剖探索出人体脏腑组织功能的先秦时期,古人通过抽象思维把人体和自然规律结合在一起,赋予实体脏器以本真的内涵,形成《内经》看待人体的独特方式,而把器与道贯通起来的正是形。

2. 藏象观中的“形” 《老子》云:“天地者,形之大者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在《内经》作者看来,阴阳之形就是天地、四时,形气的变化即是天地交感、四时更迭,形气的变化过程道亦寓于其中。而人体形气的变化顺应天地四时的变化,同样人体的病变无外乎阴阳、四时之气运行的失常。

《内经》中在描述藏象观虽没有直接以形、器论之,但都以阴阳、五行、天地、四时来指代形,相关探讨涵盖了《内经》大多数篇章,足以看出形在藏象观中的地位。其中,有专门论述藏象的内容,即《六节藏象论》一篇,文中提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中对器有明确定义,即从质的方面说明实体消化脏器对生命的重要性。与之相对,形指四时五行观下心肝脾肾四脏与四时之象相应,这里相应不是指脏器功能层面,而是古人基于对脏腑功能的体验而赋予脏腑以气的内涵来和四时之气相感应,即“肝气通于春、心气通于夏、肺气通于秋、肾气通于冬”。由此,人之形和天地之形借助脏腑之气和四时之气的相感而交融,人之形的变化即四时的变化即道的变化,等而下之的躯体和脏器即依赖此“通天下之一气”的有序运行,而气机失常则是疾病的基本病机。古人之所以看待事物从

形不从器入手,就是通过形赋予的气可以和四时相联系,最终合于道,如庄子所说的“有伦生于无形”、“形本生于精,万物以形相生”、“精神生于道”。

3. 现代藏象研究对“形”与“器”的认识误区 从上文可以看出,现代藏象学研究存在着形等同于器的认识误区,研究立足点大多从局部脏器的功能来扩展延伸,通过假说、模型来验证,美其名曰“脾藏象研究”“肝藏象研究”等。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与《内经》所描述的藏象观相悖,究其原因在于对思维观中形这一概念认识的不足,对古人由阴阳、四时与五行建立的宇宙生命观存在排斥心理,不愿意接受古代人体解剖落后这一客观现实,主客观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前的局面,即藏象学研究花样层出,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帮助甚少。

小结

综上所述,“道-形-器”对中医藏象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对形的理解尤为重要,对这一藏象观的正确领会需要结合先秦时期以阴阳、五行与精气学说为构架的宇宙哲学观为背景。相应的,正是有了中医学为载体的依托,阴阳五行才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蕴含生命信息的媒介,藏象观也才能够直接服务于临床,为中医学研究方法的突破提供了思想基础^[12]。

藏象理论正是通过四时五行、天地阴阳的形使实体脏器与自然规律相合,“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则是《内经》一以贯之的主旨。因此,把握“道-形-器”下藏象观的内涵,对体会《内经》藏象观和现代藏象学研究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韩立平.周易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 [2] 李秀娟.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船山学刊,2009,71(1):17-20
- [3] 史宁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评析.古代文明,2010,3(4):37-41
- [4] 尹小林主编.庄子.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367
- [5] 陈明校点.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
- [6]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279
- [7] 李山.管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 [8] 钱穆.人生十论.北京:三联书店,2015:50
- [9] 卓廉士.营卫学说与针灸临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8
- [10] 刘安.淮南子.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21
- [11] 刘丽,刘玮玮.《淮南子》的气论及其医学养生思想.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6):2486-2488
- [12] 王小平.论《内经》确立五脏概念的文化基础.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31(6):1227-1229

(收稿日期:2019年3月18日)

• 研究报告 •

《伤寒论》中“病-证-症”结合的量化思维探析

赵红玉¹, 杨杰¹, 王伶改¹, 蒋小敏²

(¹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 ²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昌 330006)

摘要:《伤寒论》是一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病-证-症”三位一体的辨治专书,且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定量思想。通过对《伤寒论》条文和汤证的综合分析,可以说明张仲景的量化思维贯穿于伤寒辨治体系的各个方面。文章从临床思维角度出发,在“病-证-症”三位一体的辨治过程中,探讨《伤寒论》中“病”“证”“症”3个方面的量化思维,以期为学习研究《伤寒论》和临床辨治提供思路。

关键词:伤寒论;“病-证-症”三位一体;量化思维

基金资助:江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No.5151900615)

Analysis of the quantitative thinking of the combination of 'disease-syndrome-symptom' in *Shanghan Lun*

ZHAO Hong-yu¹, YANG Jie¹, WANG Ling-gai¹, JIANG Xiao-min²

(¹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²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6, China)

Abstract: *Shanghan Lun* is a combination of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isease-syndrome-symptom' trinity, and it contains a wealth of quantitative idea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on *Shanghan*

通信作者: 蒋小敏,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445号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国医堂, 邮编: 330006, 电话: 0791-86471935
E-mail: jxzyxygt@163.com